

【区域协调发展】

东北全面振兴的蒙东新路径及其实践启示^{*}

李 曜 辉 柳 艳 红 丁 姝 予

摘要:继新常态下的“新东北现象”后,当前东北地区内部此消彼长的差异化振兴逐渐显现。基于对比视角探究东北三省和蒙东地区的差异化振兴道路,发现:东北三省受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惯性的影响,主要通过改革供给水平和供给结构,重新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供有效供给,但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供给为特征的东北振兴面临困境;而蒙东地区在煤炭保供需求牵引下,形成了供需匹配的加速振兴路径。其生成路径是:煤炭保供核心东北加速了其工业化进程,带动了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形成完整产业链,形成了口岸和核心东北边腹联动式发展。这为东北全面振兴提供了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径借鉴。为此,要尝试以需求为导向实现东北振兴的新思路;以蒙东制造业优化升级牵引东北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国际次区域产业链推动东北经济结构优化;依托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陆海新通道。

关键词:东北振兴;供需两侧;产业结构升级;蒙东地区;国际次区域产业链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5)06-0089-08 收稿日期:2025-06-10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对口支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4GLA001);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专项课题一般项目“京蒙协作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20252213220)。

作者简介:李 曜 辉,男,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柳 艳 红,女,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81)。

丁 姝 予,女,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通信作者(北京 100081)。

一、引言

开拓“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径”是东北全面振兴任务的转型所需。跨期20余年的东北振兴之路,在起始期《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中,拓展了东北地区地理概念,形成了东北三省加蒙东五盟市组成的新东北,这一布局也为东北地区完整市场、电网供需匹配和向北开放前沿确定了基调。2003—2012年东北振兴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刘海军等,2023),以经济下滑为表征的“东北现象”得以缓解,但2013年后又出现新常态下的“新东北现象”(赵儒煜等,2017);当前东北地区内部此消彼长的差异化振兴逐渐显现,原本可以忽略不计的蒙东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进入了东北地区先进行列^①。那么,东北地区振兴出现的这一新趋势,到底是新困境还是市场实践检验出的新路径?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新征程东北振兴的“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是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要立足东北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要使命,实践得出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径,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2023)。学术界对东北振兴宏大命题的关注常思常新,且在理论层面达成了一定共识。认为东北振兴屡振不兴的根本性原因是,制度和市场组织体制改革受阻、产业结构调整局部改良及其转型升级滞后、思想观念和对外开放性不足等(常修泽,2025;余森杰,2024;夏德仁,2024;蔡

昉, 2019; 赵儒煜等, 2017; 叶振宇, 2015)。其中, 常修泽提出的东北振兴“三重锈带”说具有集大成的特点, 指出振兴东北要从僵化体制锈带、板结封闭结构锈带和非现代性文明方式的锈带等三方面进行突破(常修泽, 2020)。也有学者从企业家精神层面视角提出东北振兴路径(辛本禄等, 2025)。实践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东北振兴战略政策评估(王士君, 2022)、东北振兴历程梳理及其历史逻辑分析等(刘海军等, 2023; 许欣, 2017), 整体来看, 对已有实践形成的振兴路径发掘和提炼不足, 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 且更多聚焦在东北三省, 对新晋东北蒙东地区的关注有限。这也正是本文的切入点。即通过对比核心东北和新晋东北发展趋势, 立足蒙东地区锡林郭勒盟(后文简称锡盟)的跟踪调研, 探析蒙东地区差异化振兴的生成过程, 阐明蒙东地区以需求为导向发展经济的新路径, 进一步总结并提炼东北全面振兴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的新思路。

二、东北地区涵义变迁: 蒙东地区纳入东北振兴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东北地区率先转入经济建设, 是我国最早形成的并在区域上和产业结构包括能源网络方面相对完整的大经济区(许欣, 2017)。由于其工业基础和城市化水平较好, 国家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考量下优先发展了东北地区, 计划经济时期东北地区为全国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提供了大数量的供给。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 全国对东北地区大规模供给的传统需求消退, 以经济增速下滑为表征的“东北现象”反复出现; 国家为此实施了东北振兴战略, 并根据历史上形成的市场紧密联系, 将蒙东5盟市纳入东北振兴政策区, 将原不属于东北完整自然地理和文化经济区的锡盟一并纳入(朱建华等, 2019), 东北地区涵义出现了核心东北和新晋东北的交叠, 即东北地区现指东北三省和蒙东5盟市。

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东北是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反映

东北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具备了重工业发展基础, 率先转入经济建设进程。1945年东北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85%, 城市化水平为90

23.8%, 相当于1986年的全国城市化水平^②。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思想指导下, 东北地区成为国家重点投资对象, 进行了集中且大规模的工业建设。1950年东北地区工业建设投资总额占全国投资的77%; 1953—1957年, 东北地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达34.4%, 落地东三省的156重大建设项目58个, 占实际施工总数的38%, 围绕58项重点项目配套了上千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二五”时期国家“继续加强东北的工业基地”, 仍然将有限的资金向东北地区投入了17.3%(黄巍, 2024)。东北地区成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 形成了辽宁以钢铁、机械制造为主, 吉林以化学工业为主, 黑龙江以机械、电力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主的产业格局。“三五”计划后, 东北地区不仅保持自身经济发展, 还成为三线建设支撑主力。这一时期, 国家合理利用东北工业基础推动了全国工业经济加速发展, 东北地区反映了处于前列的全国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1952年东北地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比为39:39:22, 1977年为21:63:16, 同期全国产业结构从51:21:18有序演进为30:47:43。东北三省GDP全国占比保持在12.34%以上, 1960年最高达18.93%; 辽宁GDP在全国曾经排名第1, 并始终保持前3名; 黑龙江排名处于第8至第11名之间, 1962—1976年一直保持全国第6的水平; 吉林略弱处于第16至19名之间, 在全国也属于中游水平。期间, 东北地区人均GDP至少达全国1.37倍以上^③。

2. 计划经济时期的东北提供了高水平大数量的供给

党的八大确定当时国内主要矛盾体现在建立先进工业国同落后农业国现实之间; 东北地区成为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 为全国提供了高水平大数量的供给总量, 尤其体现在工业供给方面。1952—1977年期间, 东三省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约17%以上, 1960年该比重达到29.38%。具体从工业产品来看, 这一时期东北地区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8.73%, 1960年之前钢产量占比均达到31%以上, 1950年曾经达到了全国产钢总量的51.53%; 汽车产品占全国总产量的65.25%, 1956—1958年该占比直接高达90%以上; 无烟煤、烟煤、褐煤等原煤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6.05%, 1949—1957年其原煤占比达到32%以上; 水泥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9.26%, 1949—1958年

其占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上,最高在1950年,曾达到了51.28%;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34.14%,同样在1949—1958年该占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上,在1977年仍然占比19.26%。总结而言,全国1/4以上的钢产量、1/2以上的汽车、3/10以上的原煤、1/4以上的水泥、3/10以上的发电量等均出自东北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尤其在1958年之前的新中国工业化起步关键期,东北地区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为全国形成独立的工业经济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其高水平大数量供给还体现在国家三线建设和重大工程建设上。东北地区成为三线建设支援主力军之一,为三线建设出人、出钱、出技术、出材料、出设备。其中,辽宁支援三线建设项目占全国总支援项目的32.37%,迁出职工人数占比达68.33%,实际搬迁设备占全国的54.33%(黄巍,2024)。鞍钢产钢量支撑了成昆铁路、南京长江大桥、大庆油田的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打破了“中国造不了汽车”的困境,大庆油田贡献了超过90%的国产原油,支撑了全国的炼化、运输、机械制造等产业,保障了“两弹一星”、三峡工程等国家战略工程建设。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东北地理概念变更

自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便成为国家第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和“计划经济大本营”,其辉煌历史成绩背后的主要支撑是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体制。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转变,体现在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亟需提升国民经济综合实力。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以及改革开放,东部沿海地区立足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为中国经济重要引擎,东部沿海与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其他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优势不再,全国对传统重工业产品大规模供给的需求不再集中,且其他省份产能以及国际市场产品也能够进行替代。1990年东北地区工业产值增长率处于全国倒数,至2003年,其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下滑到8.94%;其前后三次出现经济增速不升反降的“东北现象”,引起了全国对这一原核心区域的普遍关注和担忧。在此背景下,国家2003年实施了东北振兴战略,2007年正式将内蒙古东部5个盟市纳入东北振兴范畴,东北地区涵义的地理概念出现了核心东北和新晋东北的交叠,东北地区从全国

经济核心区域退变为国家经济发展“短板”,其地理概念演变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有待振兴的重要一极。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地理概念的拓展有其历史沿革和经济地理之间的密切联系。蒙东地区曾划归东三省管辖,属于比较完整的市场板块,蒙东电网是东三省电网的一部分^④;纳入锡盟也出于和东三省经济互补性的统筹规划。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供给为特征的东北振兴瓶颈

东北振兴战略实施后,东北地区在2003—2012年取得阶段性振兴成果,被称为“黄金十年”,但也有学者反思认为这一振兴成果主要依靠国家大量投入,是“水涨船高”的结果(常修泽,2020)。而东北地区2014年又一次断崖式经济下滑的新常态下的“东北现象”,印证了上述反思性认识值得思考。结合整体时间线看,当时全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实行了“扩大投资”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因此东北地区虽从经济增速上呈现为振兴表象,但其作为曾经全国“卖方市场”中重要的供给方,该刺激同时也引起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国市场的传统需求消失、可替代供给数量和质量增加、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等等。2015年国家为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强调“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东北三省响应东北振兴战略的配套政策(王士君等,2022),受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惯性的影响,主要聚焦改革供给水平和供给结构,重新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供有效的供给。当前,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依旧面临困境,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等亟待加力。

1.需求决定供给但传统需求消失

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即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不能适合买方需求,生产再多的产品也是过剩之物(金碚,2016)。需求分析框架包括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三驾马车”。1978—2002年国内需求结构是消费主导型(倪红福等,2020),全国消费需求从重工业产品转变为轻工业产品,而东北地区主要以重工业产品为主,主要提供资源、技术和产品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在东北地区所占比重很小(赵儒煜等,2017),其第二产业发展优势不再,东北三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

1978年的17.69%下降到10%以下。同时,东北地区在满足国际需求中不具备比较优势,难以与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竞争,其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相应下降,且人才、技术等关键资源开始外流到东南沿海地区。2003—2013年需求结构主要以投资和进出口为主,2008年后中国实行的大规模刺激计划,推动了全域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产生了相对的传统需求回弹,东北地区振兴取得阶段性进展。2014年至今,全国需求结构主要由消费和投资协同驱动,以新兴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重点领域消费日益凸显(倪红福等,2020),而东北地区主要是机械、化工、汽车、纺织等制造业,且竞争优势已明显下降,难以在制造业其他领域进行有效供给;与此同时,该阶段出口增长放缓,国家推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东北地区在向北开放中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在东北地区内部,蒙东地区对东北三省还存有部分的传统需求,且承接了部分产业转移,但整体需求小。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困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目标是要提高供给体系的协调性、高效性和高质性,提高其应对需求的灵活能力(金碚,2017)。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其“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做了大量调整,取得了一定进展(常修泽,2025)。但东北地区消解“旧供给”仍然是一个长期过程。东北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在钢铁、石化、装备和煤炭等重工业,但其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下降,产业竞争力大幅下降,如机床装备产业成为经营亏损产业。在全国工业产能过剩以及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全国工业较发达的地区都在加速去产能,加剧了其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东北地区改革进程中,仍然依赖工业化思维对产业结构进行局部改良。一方面,其海量投资支持国有企业的路径依赖严重,部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仍然通过政策优势与非国有企业竞争,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同质化供给。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发展受限,国有企业在本该退出的领域挤占了大量资源,提高了民营企业进入壁垒,其陷入“低端锁定”和“高端不足”双重困境中,导致产能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东北地区辽吉黑分别仅有2家、1家、3家,内蒙古4家,全国前

5名省份的民企数量均在58家以上^⑤。

从东北地区内部看,东三省资源枯竭引发其对煤炭、石油等原材料的大量需求,因此蒙东地区以其本地资源以及基于通道经济而输送的蒙古国资源等,与东北三省之间形成了供需匹配状态,但从经济发展结果看,主要对蒙东地区的拉动力更强,对东北三省的“旧供给”来说仅是维持运转。此外,东北地区创造新供给的能力不足。例如,其产业结构内部技术密集型偏低,在其制造业生产总值中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产值占比高达93%,仅有7%为技术密集型产业(韩永文等,2024);同时,其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有限,产品产量或营业收入占全国比重较低,大量的科教资源尚未转化为更高的生产率。总之,东北地区“旧供给”包袱较重,“新供给”能力较弱,整个供给体系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弹性不足。

3.国有企业承担大量社会责任致使竞争优势下降

国有企业作为特殊企业,只有其控制力增强且作为少数企业,整个区域的产业竞争力才会更强。这是因为,国有企业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混合体,既追求经济目标,也追求社会目标;一旦其追求的主要目标过于多元化,其生产要素资源会出现非专业化使用,降低了其运行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是依附于市场经济之中的计划配置资源的手段,当其所有行为适应市场法则,才能依靠市场机制为整个社会带来效率。东北地区计划经济体制退出时间晚、国有经济占比大、国有资产比重高,而且国有企业也承担着大量社会责任,部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意味着大量的就业岗位消失,将加剧失业问题。2020年东北三省国有经济占比依次为:吉林65.83%、黑龙江50.82%、内蒙古46.66%、辽宁43.21%,远高于全国26.95%的平均水平;国有资产比重为黑龙江61.82%、吉林57.46%、内蒙古54.74%、辽宁46.75%,高于全国38.95%的国有资产占比。同时,东北地区国有企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较高,其2020年全国排序为:辽宁第3、内蒙古9、吉林12、黑龙江16,结合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情况来看,辽宁第7、内蒙古10、吉林11、黑龙江22^⑥,可以看出,东北地区的工业企业亏损主要是国有企业运行效率低造成的。需要注意的是,东北地区传统优势产业属于

“大国重器”，东北地区在保障“五大安全”方面承担了重要任务，传统产业中的国有企业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国有企业因目标多元化引起的效率低下问题，解决重点在于根据国企功能，瞄准少数国有企业，增强其控制力，进而提高产业竞争力。

四、以需求为导向的蒙东地区差异化振兴路径——以锡盟为例

计划经济时期的东北地区（东三省）曾包括蒙东地区下辖市或盟，锡盟也在国家东北振兴战略提出后纳入东北地区地理概念。电网是支撑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历史上蒙东地区电网即是东三省电网的一部分。随着煤炭供应不足和区域性“拉闸限电”现象问题凸显，2021年国家提出煤炭保供政策，这与东北地区工业的持续发展和民生问题直接相关。因为迄今为止，东北地区工业化所遵循的资源技术路线依然是大规模开发利用化石能源，作为优质能源和原料，煤炭和石油及其产品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驱动力量和现代生活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在东北三省煤炭资源枯竭背景下，市场率先推动了蒙东地区成为核心东北煤炭和电能供应的重要基地，其也在全国煤炭保供中发挥作用。蒙东地区煤炭保供发展路径在东北振兴中产生了多维效益，一方面，解决了能源结构性短缺的难题，满足了区域性用能新需求；另一方面带动了欠发达地区工业的跨越式发展，正在从单纯“卖资源”向“造产业”转型，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意义重大。2003—2024年东北地区41个城市GDP排名中，2021年起锡盟跃居第16位；2024年其经济增速为蒙东地区首位，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在蒙东地区总产值中占比24%，能源企业总产值在其工业总产值中占比61%。为此，本文以新晋东北——锡盟为例，聚焦在煤炭保供需求牵引下，蒙东地区生成的差异化振兴路径，最终为东北振兴新突破提出破题借鉴。

1. 煤炭保供核心东北加速了其工业化进程

首先，煤炭保供核心东北工业和民生用煤牵引出的市场需求，是影响锡盟产业结构和布局的重要因素。其优势在于，东北三省煤炭资源枯竭，目前煤炭能源产业的产能和装备主要依靠褐煤这一煤炭原材料“配煤掺烧”，国际市场供给虽以烟煤为

主、但价格较贵且供应不稳定，因此煤炭储量丰富以及与蒙古国同属一个矿脉的蒙东地区，就近成为煤炭保供核心东北的重要角色，且在短期内难以被其他主体替代。同时煤炭开采、运销等市场机会较多，吸引了民营企业不仅在锡盟建物流和仓储设施，还通过参与组团式出海方式，在蒙古国买煤矿、开采煤炭。锡盟煤炭资源富集，探明褐煤储量居全国地级市首位，煤炭产量也仅次于鄂尔多斯，是国家规划建设的亿吨级大型煤炭基地，已核准煤矿中的保供煤矿占比3/5以上，占总产能的4/5以上，原煤产量中的60%供给给核心东北。锡盟、呼伦贝尔等地均在对接核心东北的能源保供需求，主动提供有效供给。

其次，由于保供煤需求存在季节性特征，锡盟在煤炭资源基础上“链”出了火电产业，建立了最大的坑口电厂，也是国家规划建设的9个千万千瓦级大型煤电基地之一。2024年，其建成并投运的电厂为21个，火电发电外送占比达85%，并通过远程传输，满足了长三角、京津冀、东北的用电需求。其火电产业产能不仅满足了对核心东北保供的需要，同时还供给了周边盟市和自用电的需求。2024年锡盟煤炭产量中保障东北三省的占比达25%，保障周边盟市占比27%、盟内自用占比45%。不同于东北三省在振兴过程中产业发展主要依靠海量投资的原生路径依赖，锡盟产业发展路径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数量扩张的同时推动结构转换和质效提升，即通过资源-技术路径，实现从“资源优势”到“发展优势”转变，巩固拓展优势积极开展跨区域协作，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如引进吉电、一汽等大型国有企业，通过“资源-技术”的深度绑定，从源头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

最后，锡盟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积极发展新能源，用以弥补火电供应量，并逐渐成为电力供给增量主体，其中近70%的“绿电”通过电力外送通道送至东北、北京、华北等地。其主要做法就是依托能源优势兼顾多维效益、融合东北三省技术优势、依托区位优势率先市场化转型，积极融入全国电力市场，聚焦绿电输出、装备制造、低碳转型，实现了从单纯“卖资源”到全面“造产业”，从“煤电基地”到“绿电心脏”的转型，开启了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进程，塑造了发展优势。

2. 推动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形成完整产业链

锡盟工业经济中能源产业是支柱产业,2024年能源企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61%。其能源产业中,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同样加速发展,其发端也是煤炭保供核心东北驱动。具体来看,由于火电发展支撑和外送通道条件成熟、与电能消费集中的市场距离近,在发展绿电补充火电供应需求牵引之下,为解决风机、叶片长距离运输的高成本问题,锡盟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从无到全”迅速配套发展起来。截至2025年,锡盟已集聚风电产业链上下游企业43家,具备年产3100台风电主机、1300套风机叶片、500套塔筒、1200套机舱罩、700套锚栓、500台高低压配电柜、9000千米电线电缆的能力;在光伏领域,已有13家光伏装备制造企业落地,已形成年产1吉瓦光伏组件、15万吨光伏支架、3吉瓦光伏逆变器、2300台箱式变压器及1000万米光伏管桩生产能力;在氢储能装备制造产业链方面,推动远景能源、元动新能源等项目落地实施,已形成年产14吉瓦时储能电池、1吉瓦储能双向变流器生产能力。形成了从整机生产到关键零部件协同发展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另外,能源产业的市场需求牵引,倒逼了地方政府以市场机制为核心,更好发挥职能的路径。企业在锡盟布局的主要原因还包括锡盟近年来营商环境较好,政府通过绿电低电价优势、高效为企业服务以及其他支持政策等吸引企业投资^⑦。调研发现,虽然锡盟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已初步具备集聚优势,但在关键技术、材料应用和数字融合等方面亟待突破。

3. 抓住向北开放机遇,推进边腹联动式发展

在煤炭保供市场需求牵引下,锡盟口岸和东北三省边腹联动的发展模式初具形态。锡盟有二连浩特、珠恩嘎达布其两个国际性常年开放口岸。以珠恩嘎达布其口岸为例,其对应蒙古国毕其格图口岸,蒙古国已探明煤炭蕴藏量约1620亿吨,东北三省具有2亿吨以上的煤炭缺口。就市场响应而言,吉电、铁盛、彭翀等原在东北三省内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纷纷来该口岸建厂投产,并与当地企业联合组团式出海,在蒙古国设厂招工、装备出海开采;吉电在口岸建立了大型储能基地,形成了煤炭“进口—储备—加工—运输—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体系。该口岸进口货物主要为煤炭、铁精粉、锌精矿、

萤石等重要资源类产品,出口货物主要以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二手车等为主,与东北地区的优势供给互补性较强。其铁路线“珠恩嘎达布其—珠斯花”铁路,联通东北三省铁路网通达锦州港、大连港等东部港口。2024年在中蒙煤炭贸易量3000万吨中,该口岸共完成400万吨,且其货运量增速较快,同比增长了48%^⑧;同时,形成了褐煤混合加工等落地经济形态。口岸和核心东北之间边腹互动的合作经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东北三省的煤源短缺问题,保障了其工业和民生能源供应。

五、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全面振兴的新思路

东北全面振兴是东北三省和蒙东地区共同振兴;新时代新征程东北振兴的“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对比核心东北振兴面临的困境和新晋东北差异化振兴路径,东北三省以供给为特征的振兴之路一直反复进入瓶颈,而蒙东地区以需求为导向的差异化振兴趋势较好。总的来说,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全面振兴新思路的重心仍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要更加关注市场需求的牵引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根到底是要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的弹性(金碚,2016);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有利于核心东北和新晋东北全面的、全方位的振兴。

1. 尝试以需求为导向实现东北振兴

目前蒙东地区之所以呈现出振兴的良好态势,主要原因在于其供给体系与核心东北的有效需求适配性高,有效需求牵引和催生了有效供给。这体现了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东北振兴实践路径。过去二十多年间,东北振兴没能实现既定目标,是因为区域内没有形成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产业;未来东北振兴应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尝试需求引领路径;抓住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大机遇,以需求为引领,整合国内外经济主体,形成需求牵引的完整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核心东北和新晋东北具有相同的发展根基,都形成了以能源、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产业体系,而工业发展具有稳定演化的特点,产业发展是有序演进的。以目前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情况来看,依然需要投资拉动,但更多要依靠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使东北地区的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产值和产能利用率都有明显回升。

2.以蒙东制造业优化升级牵引东北产业转型升级

发挥蒙东地区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对东北产业发展的牵引作用,通过区域协同打造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以“资源+技术”双轮驱动的循环带动模式,推动东北地区产业突破。以风电装备制造业为例,虽然有中船风电、上海电气、中材科技等著名企业进入,但由于地区工业基础薄弱,纵使发展起了便于零件组装的叶片、塔筒、机舱罩、风机基座等产业环节,但技术含量高且不便于组装的发电机、高端轴承、齿轮箱、变压器等产业环节还有待技术环境成熟后才能落地达产。上述环节的技术要求,对于东北三省成熟企业来讲并非难题,只要转变发展方式——从供给推动向需求引领、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就可实现东北从传统重工业向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这就需要核心东北和新晋东北合力锻造竞争优势,聚焦资源优势,拓展国内外新能源市场需求,牵引传统产业向绿色、高效、智能化发展,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打开市场,加速“破圈”。

3.构建国际次区域产业链,推动东北经济结构优化

在财富创造过程中,产业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着不同地区在经济体系中增值的多少,标志着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程度。东北地区要顺应市场趋势,积极参与构建“东北三省+蒙东+蒙俄”产业链,以国际次区域产业链推动东北经济结构优化。因为,目前有的国家需要更大、更稳定的市场,有的国家需要快速的工业化来满足公民改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迫切诉求,有的国家需要疏解过多的工业产能,同时需要优质能源和原料来弥补发展缺口。对于东北三省而言,这里曾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是中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原材料基地和现代农业基地。近年来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由于过度投资、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产能过剩较为突出,急需向外疏解,迫切需要通过中蒙跨境区域产能合作的方式,向有需求的地区疏解。对于蒙东地区而言,在21世纪之前,大部分地区还是纯牧业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工程的实施,工业化进程得以开启,但也只是刚刚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到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阶段,蒙东地区迎来了快速工业化的契机,因为“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要发展中国同亚欧国家,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经

贸关系,更主要的是,中国希望通过战略的实施,完成既有发展模式的彻底转型。

4.依托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东北陆海新通道

中蒙俄经济走廊分东、中、西三路,东路由东北、华北经珠恩嘎达布其口岸出境至蒙古国东部,中路由华北、东北经二连浩特出境达乌兰巴托、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路由西北经策克口岸出境进入蒙古国西部地区。三条线路中,东线珠恩嘎达布其口岸近年来发展迅速,而且又有东北、华北经济区作为重要的战略腹地,区位优势和辐射效应为打造陆海新通道奠定了有利条件。一方面,优化以铁路为主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珠恩嘎达布其口岸是东北内陆地区距离出海口最近的口岸,珠恩嘎达布其口岸至锦州港出海通道已初步形成。如果连通“巴珠线”与“珠珠线”,珠恩嘎达布其口岸经大阪经阜新至锦州港距离为857公里,要比珠恩嘎达布其经霍林河经通辽经阜新至锦州港缩短近300公里。有利于加强口岸带动、腹地支撑、边腹互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带动东北地区全域振兴。目前,东北地区的“锦州港—二连浩特/满洲里/珠恩嘎达布其—蒙俄”三路并进的公铁海联运通道已经形成,同时也建立了“蒙俄—东北—长三角”南北双向开放通道。这意味着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需求牵引力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应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深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合作。

注释

- ①说明:2024年东北地区城市GDP排名显示,前4名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为计划单列城市和副省级省会城市,大庆、鞍山、吉林是国家重点工业基地,拥有多家大型央企;而蒙东地区的赤峰、呼伦贝尔、通辽作为后起之秀,自2018年起陆续进入前10排名,2024年分别居于第6、第8、第9位次。这与蒙东地区和东三省的互补型市场供需联系有关,后文将具体说明。
- ②数据来源:常修泽。中国东北转型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第65页。
- ③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计算。
- ④资料来源: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扩大区域范围 内蒙古东部被纳入,http://cn.chinagate.cn/economics/2007-08/20/content_8712947.htm。
- ⑤数据来源:中国全国工商业联合会: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https://www.acfic.org.cn/qlw/202410/t20241012_205055.html。
- ⑥数据来源:《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20》。国有经济占比=其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其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 ⑦资料来源:锡林郭勒盟发展能源

装备制造产业综述, <https://www.xlgl.gov.cn/xlgl/zx/mnyw/2024051509281559262/index.html>。⑧资料来源:珠恩嘎达布其口岸货运量首次突破400万吨,刷新历史最高记录, <https://swj.xlgl.gov.cn/swj/ywgz/dwmy/2024122711482731478/index.html>。

参考文献

- [1] 刘海军,张超,闫莉.东北振兴二十年历程与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J].改革,2023(9).
- [2] 赵儒煜,王媛玉.论“东北现象”的成因及对策[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 [3]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10.
- [4] 常修泽.变“三重锈带”为“四新突破”——东北“加力振兴论”探讨[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1).
- [5] 余森杰.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机遇和任务[J].人民论坛,2024(2).
- [6] 夏德仁.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东北全面振兴[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6).
- [7] 蔡昉.从比较优势到规模经济:重新认识东北经济[J].学习与探索,2019(9).
- [8] 叶振宇.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态势与新一轮振兴[J].区域经济评论,2015(6).
- [9] 常修泽.中国东北转型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
- [10] 辛本禄,张文涛,刘子嫣.基于中国式企业家精神视角的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路径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5(1).
- [11] 王士君,顾萌,常晓东.东北振兴政策体系解构及区域经济响应研究[J].地理学报,2022,77(10).
- [12] 刘海军,张超,闫莉.东北振兴二十年历程与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J].改革,2023(9).
- [13] 许欣.东北振兴战略演进轨迹及其未来展望[J].改革,2017(12).
- [14] 朱建华,修春亮.1949年以来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演变格局与成因分析[J].地理科学,2019,39(4).
- [15] 黄巍.新中国75年跨区域工业经济布局历史演进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24,44(11).

The New Path of Comprehensively Revitalizing Northeast China: A Case Study of Inner Mongolia's Eastern Region and it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Li Xihui Liu Yanhong Ding Shuyu

Abstract: After the “New Northeast Phenomenon” under the new normal, differentiated revital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ebb and flow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in Northeast China has gradually emerged. This paper first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clarifi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s betwee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and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in terms of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and energy networks, and depict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ifferentiated revitalization paths of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and Eastern Inner Mongol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nstrained by the inertia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China,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mainly improve supply capacity and optimize supply structure through reforms to re-provide effective support for the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however, the supply-driven revitalization model faces inherent predicaments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system. In contrast, driven by the demand for coal supply guarantee, Eastern Inner Mongolia has formed an accelerated revitalization path featuring supply-demand matching.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is as follows: as the core area for coal supply guarantee in Northeast China, Eastern Inner Mongolia has accelerated it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in the new energy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realized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pattern between ports and the core-border areas of Northeast China. This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as a “new path for sustainable revitalization”.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policy implications: adopting a demand-oriented new approach to Northeast revitalization; driving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Northeast China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sub-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s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n Northeast China; and building a new land-sea corridor relying on the China-Mongolia-Russia Economic Corridor.

Key Words: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astern Inner Mongolia; International Sub 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

(责任编辑:平萍)